

纤夫远去号子悠

从劳动号令到国家非遗的川江号子

本报记者韩振、刘博伟

“如今，我带着您教我的那首歌，从朝天门唱到天安门，从长江头唱到长江尾，从嘉陵江岸唱到香江两岸……”

我相信，这川江上的号子声，一定会从三峡的深处飞出去，飞向更广阔的世界。”

曹光裕，川江号子唯一国家级传承人。今年教师节，给恩师陈邦贵写下了上面的话。

寥寥几句，写出了川江号子的前世今生，更写出了川江号子日益光明的未来。

江上传承

川江号子，是船工和纤夫为鼓舞劳动士气、统一劳动节奏而产生的一种“一领众和”的民间歌唱形式，距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。作为木船时代川江流域的一种工作号令，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时光倒流。“拉渡纤藤，哟！吹……”1987 年的一个下午，23 岁的曹光裕和往常一样，在朝天门码头的一艘趸船上，吼着高亢的号子，卖着大把子力气。那时，趸船多未装上发动机，遇到水涨水落，只有靠着船工们合力拉动。号子，便会响彻江岸。

尽管拉船时戴着手套，穿着很厚的衣服，曹光裕和工友们的肩膀和手掌，还是难免被钢绳磨破。

同一时刻，川江段最出名的号子头陈邦贵老先生，在法国唱响了这样的号子声，获得了“可以同久负盛名的《伏尔加河船夫曲》相媲美”的赞誉。

载誉归来后，川江号子的艺术价值被认可，如何传承下去也变得更加必要和急迫。曹光裕跟陈邦贵属于同一个轮渡公司，但此前从未谋面。一次歌唱比赛中，曹光裕洪亮的声音，深深打动了陈邦贵。两人从此结缘：曹光裕成为陈邦贵老先生的亲传弟子。

那时候，船工们最怕号子响。号子头一吼嗓子，就意味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了。曹光裕当时还想不通：号子怎么就成了艺术呢？

虽然确定了师徒名分，但每天被繁重体力活压得直不起腰的曹光裕，对学习号子却非常排斥，从不主动去找师父学习，甚至听到师父来码头找他，还想方设法悄悄溜出去。心想，这老头儿扑空几次，应该不会再来找他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别人告诉曹光裕：码头上站着个老头，看着像你师父陈邦贵，怕是要跳江。

曹光裕赶紧跑过去，走近一看，果然是师父。只见师父拄着个拐杖，默默地注视着江面，一言

不发。

曹光裕问他要干啥，是不是想不开。他说没有，就是有点难受：我都 70 多岁了，能活到哪一天都不知道，就怕眼睛一闭，川江号子民间艺术瑰宝就失传了。

曹光裕看着师父，突然觉得很心疼，刻骨铭心的疼。

回忆起当年在江边正式拜师的情景，曹光裕眼圈泛红，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再早点儿理解师父的苦心。

尽管被老先生的精神所感动，年轻的曹光裕还是对川江号子难有深情。直到随着机动铁船的普及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，喊号船工渐渐没了用武之地，川江号子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和其他很多下岗船工一样，转行上岸的曹光裕，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着“四处求职、八方碰壁”的窘境。

沉重的生活压力下，他发现喊几声号子，能抒发心中的抑郁。这时，他才深深地认识到：川江号子里，蕴含的是向上的力量，是一股永不放弃、抗争命运的精气神儿！

真心爱上川江号子的曹光裕，终于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，这才踏踏实实向师父学习。他暗下决心，不仅要让川江号子的精神延续下去，还要让它创造出更大价值！

舞台新生

2006 年，川江号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，保护整理工作得到了更多政策支持和社会关注，也让曹光裕这些传承人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畅。

国家修好了文化传承的“高速公路”，曹光裕所做的，就是打通对接民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非遗文化传承，生产性保护是一条出路。2014 年，曹光裕把一些对川江号子有了解、有情怀的老船工和家属组织起来，以“重庆老船工艺术团”的名义对外承接演出。

今年国庆期间，《大江传歌》“2.0 版”在重庆国泰剧院和南山植物园多次上演。这部由老船工艺术团演绎的大型互动情景体验剧里，热闹喧嚣的朝天门码头，往来如织的木制船舶，此起彼伏的船工号子、搬运号子……

场景穿越时空，号子穿透灵魂。大江传歌，一票难求。

演出，只有创造价值才能演下去；演员，只有演下去才有稳定的收入。好的演出，需要好的演员；好的演员，才能给出好的演出。只有形成了良性循环，文化传承才能绵延不息。

说不尽的曹禺，演不完的“曹剧”

纪念曹禺诞辰 110 周年

宋宝珍

1910 年，一个名叫万家宝的孩子诞生于天津。1934 年，他以曹禺的笔名发表了剧作《雷雨》（此前曾以此名发表小说），此后又创作或改编了《日出》（1936 年）、《原野》（1937 年）、《北京人》（1941 年）、《家》（1942 年）等优秀剧作，这些剧作脍炙人口，成为经典，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，不仅被译成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意、日、韩、蒙古、西班牙语、阿拉伯等多种语言，而且在各个剧院和中外舞台常演常新。其戏剧还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、舞剧、歌剧、京剧、地方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。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先后 15 次创演、复排曹禺的 8 部话剧。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一些名噪一时的作品逐渐归于沉寂，而曹禺的戏剧却越来越凸显其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。

“写《雷雨》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”

曹禺是谁？以他 23 岁创作杰作《雷雨》的经历，他简直是艺术史上的奇迹；而以他 35 岁之前才华横溢，此后便一直处于“正在写”而写不出的状态，他又又是特别值得研究的案例。曹禺曾经对给他写传记的田本相说，你要写我，先要写出我的苦闷来。

曹禺的苦闷首先来自家庭的氛围：他的父亲万德尊曾经在日军陆军士官学校留学，这个学校出过很多中国军事名人，如蔡锷、蒋百里、阎锡山等，万德尊归国后曾任民国总统黎元洪的秘书，无奈政治局势波谲云诡，黎元洪倒台，不足 40 岁的万德尊赋闲归家，在天津海河边上购置了一座西式洋楼，过起了离奇生活。

万德尊的第一位夫人年轻轻去世，曹禺的母亲嫁入万家，却在生下曹禺三天后因产褥热逝世。事业家庭皆不如意，万德尊便在家中聚集一帮落魄文人，人前他排遣抑郁，纵情诗酒；人后他歇斯底里，乱发脾气。曹禺的父亲、兄长都吸食鸦片，常常是在曹禺放学回家时，他们还沉睡未起，家中如坟墓般萧索、冷寂。

曹禺的继母是他生母的孪生妹妹，对待曹禺视若己出，曹禺一直认为继母就是生母。可是刁钻的女仆刘妈在与继母有了嫌隙之后，就故意告诉曹禺：她不是你的亲妈。童年的曹禺在知道生母已逝的那一刻，便内心悲戚，顿觉无所归依，从此那种孤独飘零的情愫萦绕他一生。在他 18 岁的旧历新年，家道败落后父亲突然病逝，除夕夜家人都在迎新纳福，曹禺却不得不向亲友报丧求助，当那些院落的大门被敲开时，迎接他的是惊诧、厌恶，那种寒冷令他发怵。

曹禺说“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湿”，“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仓促、切迫”，他的家庭和周遭发生的事情，都刻印在他的心里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他说，“写《雷雨》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”“一种无名恐惧的表征”“《雷雨》的降生，是一种心情在作祟，一种感情的发酵”。曹禺的写作来源于自我抒发的生命表达。

歌德说过，艺术是人类精神灌注其中的产物，对于创作者而言，不仅耗其神思，而且劳其筋骨。抗战时期，曹禺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专做教授，战火中的辗转奔波、教学中的劳心费神，让他的创作受到影响，他那如江水般奔涌的创作才思受到阻碍。

抗战戏剧风涌之时，各处都需要剧本，很多人向他催稿子，可是他一时半会写不出来，就对人家说，正在想，正在想。以致后来他有一个剧本的名字，真的就叫《正在想》。

他的创作起点很高，一直都在想着出大作品，出好作品。他在写作剧本《北京人》时，想着要突破自己，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艺术目标。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全力以赴，他居然躲到长江边上一条抛锚的江轮上去写作。三伏天的甲板上依然闷热，曹禺就打着赤膊，日复一日，挥汗如雨地写作。江岸边上的纤夫们看到他如此辛苦，问他在干什么？他说在写剧本。纤夫们感慨，总以为自己是苦人，原来写个剧本也是这么苦。

这一时期曹禺结识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大家闺秀邓译生，邓译生后来改名方瑞，曹禺每写完一部分剧稿，就交给方瑞誊抄。方瑞以一手秀雅端庄的蝇头小楷，把稿子抄写出来，其中一部分手稿在北京人艺的戏剧博物馆里还能看到。这既是珍贵的戏剧文物，也是艰苦岁月里他们用心血淬炼的艺术结晶。

曹禺渴望灵魂的自由，他笔下的人物是他灵魂的表征。繁漪“最雷雨的性格”里有对爱情的渴求、对自由的向往，她想冲破压抑沉闷的周公馆，摆脱“最有秩序的家庭”当中最难忍受的被动服从，找到一片能够畅快呼吸的自在天空。

《日出》中的陈白露家道中落之后，成了大饭店的交际花，靠着出卖年轻漂亮的身体，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。直到曾经的同学、她的痴恋者方达生到来，叫起她以前的名字，直到她感知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小东西的悲惨结局，她才终于明白，在大鱼吃小鱼、小鱼吃虾米的资本世界里，她想在饭店里找到苟且偷安的一隅是多么的可笑幼稚。她在肉体已经深陷泥淖之时，依然保持着灵魂自由的渴望，她用安眠药葬送了自己的人生，却把自由的灵魂安放到阳光下的青草地上。

《原野》中的仇虎被复仇的意念所控制，然而



▲ 12 月 10 日，2020 世界大河歌会上表演的情景舞蹈《川江号子》。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

老船工艺术团的演员们，每个月可以拿到上万元的演出费。

演出的火爆，不仅得益于川江号子本身的历史文化魅力，也离不开演出形式上的创新。

原汁原味的川江号子，唱词单一，重复性高，表演时间短，如果完全照搬上舞台，观赏性将大打折扣。

为让节目更好看，曹光裕拉上音乐科班生出身的儿子曹羽，按照七分原味三分创新的比例，调制出了情景剧《大江传歌》。

2018 年 8 月，《大江传歌》搬上舞台。两年间，在两江游船上完成了 300 多场演出，受到游客的好评和赞誉。

但曹光裕创新脚步，并未停滞不前。他历时半年，走访川江流域及其支流，广泛收集素材，把这部情景剧打磨成了“2.0 版”。

“回想当年船工，生死鬼门关，临危不惧……”一个普通的周三上午，重庆文化馆的排练厅里，头发花白的老船工杨志均正在排练着新版《大江传歌》主题曲，为即将到来的密集演出做准备。

今年 67 岁的杨志均，是最早加入艺术团的成员之一。一开始，家人并不支持他参与排练和演出。儿子数叨他：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就在家帮忙带孙子多好，非要搞这些“空名堂”。

后来，儿子眼看着他身体越来越好，不仅好几次在中央电视台演出，还能跑到上海、南昌等地演出，电视上也经常播出父亲的节目。儿子开始为他

感到骄傲：我老汉儿还是可以！

和杨志均一样，很多老船工下了船，反而更怀念当初一起拉纤喊号子的时光，能有这么一个舞台聚在一起喊喊老调子，唱唱自己的故事，觉得很充实、很幸福。

如今，这支平均年龄 65 岁的表演团队，已经由最初的不足 10 人扩增至 50 人。

从普通船工到职业演员，改变的是歌者的身份，不变的是对川江的依恋；

从单一的劳动调子到大型互动体验剧，变的是川江号子的表演形式，不变的是那一声声呐喊里，不向贫穷苦难低头的冲劲儿；

从江面木船到一个又一个舞台，变的是演唱场所，不变的是那一根根纤绳里，劳动者与命运搏斗的动人故事。

川江号子，从水上唱到了岸上，从岸上唱到了舞台上，从舞台上唱到了观众的心里，从观众的心里进入时空的隧道。

它在那里传诵，经久不衰。

归于生活

回归生活，这是曹光裕最新的追求。川江号子既然是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，就绝不该仅仅在舞台上、在艺术层面得到认可，而应该回归大众，回归生活。

虽然号子的生产形式和行业消失了，但其



▲ 曹禺 新华社资料片

复仇之后的归宿却是他向往的“金子铺地的地方”，尽管他也说不清那个地方在哪里，怎样才能到达。但是，在他的梦想之中，那里至少不会有焦阎王那样的恶霸，不会有人与人为虐我诈、相互欺压造成的仇恨的毒芽。那里应该有一个像原始的“北京人”那样的生命，他不管制造了“死活人”“活死人”“活人死”的社会规约，他有足够的力量打碎一切桎梏，想爱就爱，想恨就恨，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创造力、符合人类存在的本质意义的人。哪怕历经苦难，到了生命尽头，也像《家》里的瑞珏一样，望着漫天的飞雪，依然相信“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”。

“继鲁迅之后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”

曹禺说：“我喜欢写人，我爱人，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；我也恨人，我写过卑微、琐碎的小人。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，又是多么难以理解。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——‘我把人说清楚了’。”田本相在《曹禺传》中写道：“他是继鲁迅之后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。”

《雷雨》中曾经在德国留学、成为矿业董事长的周朴园，在他认为最有秩序的家庭里却制造了

个社会的鲜明群像，他们不仅有生命的质感、人性的内涵，更有时代的烙印、哲思的韵味。

如果在社会中发现一个问题，就写一部戏剧，那么戏剧除了承载问题之外，便没有了艺术的旨趣。曹禺讲究的不是戏剧合不合局部的、暂时的意念之“槽儿”，而是讲究戏剧够不够人性的、美学的“味儿”。曹禺说：“现实主义的东西，不可能那么现实。”曹禺的戏几乎没有确切的背景，要有也是十分模糊的。曹禺曾说，他不会茅盾的小说《子夜》那样，在明确的历史时间概念中对现实生活的内容做出逼真的再现。

他说写《雷雨》是在写一首叙事诗，既然是诗，就要有诗的韵律、意境、风骨、神韵，要有温柔敦厚的中国诗学之道，“人毕竟是要生活的，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，腐肉挖去，新的细胞会生出来”。因此他描写现实却不拘泥于写实，他能在污秽中看到圣洁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，表现对发展趋向的理想主义的憧憬。《日出》中漫天红霞里回响的雄壮的齐歌，《北京人》中榛方、瑞珏奔向自由的步伐，都是沉郁、幽暗背景中绚丽的曙光，是对现实生活的诗化、寓言化的表达。

中国优秀的剧作家都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，即他们对中外戏剧广博的涉猎和高深的素养，如田汉、郭沫若、洪深、李健吾、杨绛，等等。曹禺的阅读兴趣很广，从戏曲剧本、古典诗词、小说，到外国哲学、美学等，再到古希腊戏剧、古罗马戏剧以及莎士比亚、易卜生、奥尼尔、契诃夫等，他都颇感兴趣。他的戏剧里常常涉及神秘、原始、恐惧、梦魔，这些几乎是表现主义戏剧的典型意象。但是，他的戏剧叙事方式却是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。他的戏剧结构很讲究，善于讲述一个有头有尾、有悬念、有张力的戏剧故事，而故事当中，充满了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和诗学正义，这也是他的戏剧被中国观众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。

戏剧与文学不同，仅有文本，它的存在形态只完成了一半，只有立在舞台上，才能焕发艺术的光彩。曹禺的戏剧培养了多位导演艺术家，他们在各自的艺术追求的向度里，展示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造诣。曹禺的戏剧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员，剧中那“金刚石般”掷地有声的艺术语言，浑茫繁复的人性内涵，爱到极致、恨到残酷的情感纠缠，还有戏剧情境所显现的哲学意味，让演员们在艺术创造中磨炼心性，提升水平。曹禺的戏剧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，人们走进剧场与伟大的剧作家灵魂对话，与戏剧情境融通，除了感受曹禺戏剧的经典性，也间离了现代背景下庸常、匆促的人生。